

第一章

永康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环境

永康，蕞尔邑也，地无城堞，田不常稔，户鲜宿粮，市缺百货，民生其间，盖亦难矣。然自宋元以来，人豪人师，高名显爵，与夫笃行姱修之士，里巷茁茁，接踵而起，岂非山水之灵所蓄欤！^①

这段话，作为清康熙《永康县志》序言的开篇，简洁地勾勒出了永康的特点：地小，贫穷，人民生计困难，但是它的山水之灵却造就了宋元以来的许多名人雅士。

一、地理位置

永康位于浙江省中部，原属婺州，即金华府。永康最早以地名出现是在三国吴赤乌八年（245年），当时划出乌伤县上浦乡以置永康县。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永康及整个江浙地区属越国。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并于次年在原越国地置会稽郡。^②会稽郡原辖15个县，永康地区属乌伤县。^③

清康熙《永康县志》里有一段对当地环境及其影响的十分生动的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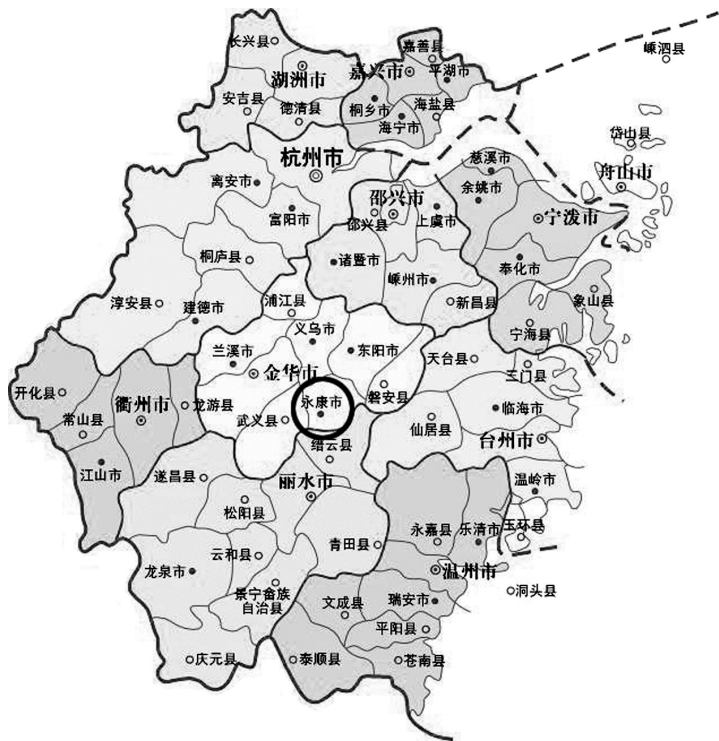
县地多山少水。故其民多重质而少权操，好刚果而乏深沉。僻在东南，

^①（清）沈藻：《永康县志·序》，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蕞：小的；稔：庄稼成熟；笃行：行为淳厚、踏实；姱修：品德高尚美好。

^② 越国原拥有今浙江大部 and 江西部分地区，定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公元前494年，向北面的吴国臣服。公元前473年灭吴后尽有吴国故地，将地盘扩展到了今山东东南部。战国时，势力衰弱，公元前306年，为楚所灭。

^③ 乌伤属越语地名，是越文化的标志。



永康位于浙江省中部

滩涩岭阻。非舟车之所臻，商贾之所聚。故民安土而不轻转徙，敦本而军事事懋迁。壤瘠而狭，生理艰难。故其民俭嗇而不竞繁华，勤苦而不甘游惰。……安居相聚，无主客之分。故耻于屈伏，激而喜争。^①

浙江旧时分为婺、衢、严、台、温、处、甬、绍上八府和杭、嘉、湖下三府。永康所属金华府，位于浙江中部，是各府之间联系的必经之地。永康地形属浙中丘陵盆地，其境内山体多为仙霞岭的余脉。仙霞岭位于浙江西南部的浙闽赣交界处，大体呈东北 - 西南走向，浙江境内的大盘山、天台山、会稽山等都是它的延伸，所以它又有“浙东诸山祖”的尊称。仙霞岭又是浙江两大水系，钱塘江水系和瓯江水系的分水岭。其中钱塘江水系主要位于下三府境内，也包括婺州、衢州和严州的部分地区；瓯江水系则主要位于台州、温州和处州境内。永康位于这个分水岭的西侧，和

^①（清）沈葆：永康县志·卷六·风俗，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瓯江水系没有任何联系，和钱塘江水系的联系也十分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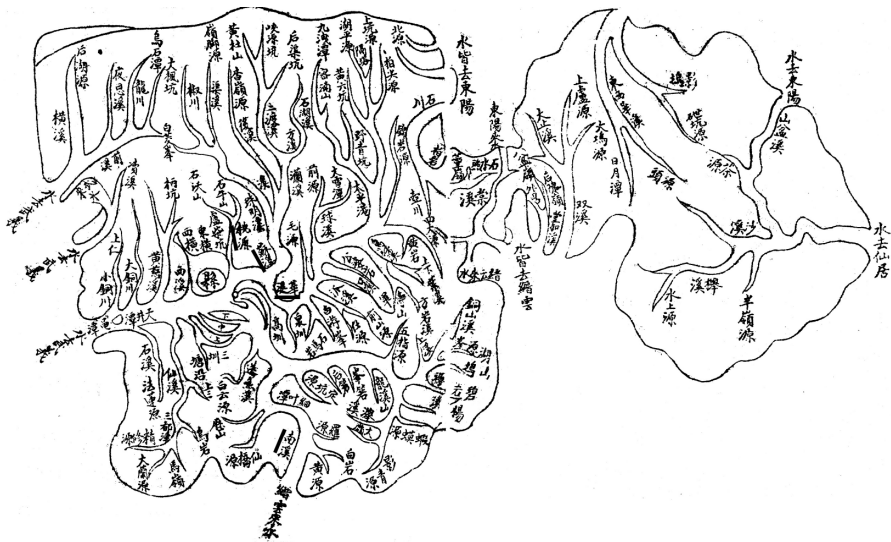
永康中部是呈东北 - 西南走向的永康盆地，其中华溪自东北向西南贯穿盆地。华溪在永康旧城东北角外先后有从北面南下的酥溪、桃溪（又名北溪）并入，随后在城南与从缙云发源的南溪汇合，自此“水始胜舟”。^① 华溪^② 继续向西，经武义到达金华境内，最终与钱塘江水系衔接。虽然华溪在流出永康境内之前的一小段可以通舟楫，但是它是“一衣带水耳。天久不雨，则石棱锋出胶浅，且不胜一筏。是以外乡珍异之物亦罕得至者”。^③ 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永康盆地与处于江浙地区经济中心位置的杭嘉湖平原没能建立起便利的水路往来；与经济发达的宁绍平原、港口城市温州更因为缺少水路联系而没能形成贸易往来。在铁路出现以前，货物的长距离运输主要依靠舟楫。再加上浙中丘陵众多，走陆路会有群山阻隔。所以永康是“非舟车之所臻，商贾之所聚”^④ 的地方。因此，这里没能像浙江的大部分村庄一样，自南宋起就开始大面积种植如棉花、桑麻、茶叶等经济作物，或是发展丝织、制陶、造纸等手工业，也没能形成依附于此的运输业和商业。



浙江水系图，永康位于仙霞岭余脉的西侧

-
- ① （清）沈藻，永康县志·卷二·山川，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② 近代，华溪自此改名为永康江。
③ （清）李汝为，永康县志·卷三·田赋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
④ （清）沈藻，永康县志·卷六·风俗，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直到清末民初年间，永康才成为位于仙霞岭两侧城镇之间的货物转运地。那时永康有3家过塘行，分别是位于河头的“吕中和行”，章店的“协和行”，以及芝英的“广裕行”。他们将来自于钱塘江水系的草籽、茶油、豆饼、猪鬃、煤油、绸缎等货物运到永康，再用肩挑、骡马运输、车推的方式运到台、处、温州等地。同时来自于台、处、温州的木材、桐油、茶叶、棉花、草席等山货以同样的方式被运到永康，再由过塘行运到浙江其他地方。这种水路陆路混行的方式，在抗日战争初期，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迁驻方岩，转运物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瞬间，永康境内的转运行，也由开始的3家一下发展到30多家。



永康山水图 ((清)李汝为:《永康县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卷首,图说)

二、历史变迁

浙江地区是越文化的发源地，也曾经是亚洲东南部“百越”文化的中心。由于交通和环境的原因，越文化和中原文化在饮食、服饰、风俗和宗教信仰等多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公元前223年，秦王灭楚之后，在原越国属地置会稽郡，开始推行汉、越两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但是由于秦朝采取的手段强硬，再加上受长年战争的影响，

会稽都是当时全国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地区。

西汉时期，持续的人口增长是浙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开始。例如，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的一次全国大规模移民过程中，据清代学者王鸣盛的估计，有十四万五千贫民迁入会稽。^① 再加上西汉末年，又有大批北方士人、农民和手工业者逃到江南避乱。这些移民不但带来了中原的文化，还有北方地区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更多的北方人为避战乱而移民江南地区，从而使江浙地区的人口又有大幅度的增长。接下来的隋唐盛世和大运河的开通，使南北方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进入了新的阶段，浙江地区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再次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作为汉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于公元六世纪始创于浙江天台山。到唐朝末年，“大悲寺”在永康境内的方岩山上落成，并逐渐发展成一座天台宗名刹。

宋朝的建立标志着长年征战的结束，以及中原和江南地区文化和经济的长足发展。在北宋时期，浙江已经成为北宋王朝的经济中心，以及新儒学运动的萌芽地和重要传播地。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随着大批文人墨客、士官大夫的涌入，浙江又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与此同时，浙江境内踊跃出的各类人才均居全国之首，其中包括宋史列传人物 136 人、宰相 22 人、词人 138 人、画家 69 人和儒者 421 人。^② 难怪朱熹曾经感慨地说：“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两种以反对传统经学和理学的革新思潮——事功学和心学在浙江应运而生。事功学三派均起源于浙东，分别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而永康学派主要的讲学地点就在方岩山北边的寿山坑内。

明清两代，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浙江部分田地转而种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部分劳动力也从农业劳作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创造了条件。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 年），货币税制取代了徭役制。明万历十六年（1588 年），雇用人员的自由人身份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和保障。这两项变革，进一步促进了民间私营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末清初以后，方岩山上和山下老街两侧就逐渐形成了依附于广慈寺宗教活动的，制作和销售香烛供品、食品及杂货的手工业

^①（清）王鸣盛·汉书·武帝纪·十七史商榷。

^② 腾复，浙江文化史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89。

和商业；后来又发展了颇具规模的，依托于朝山进香香客的旅店业。

三、文化特点

回顾浙江的历史可以看到，由于受越文化的影响，浙江地区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信鬼敬神和重利事功的特点。越人信仰的“鬼神”多为福祥之神，其中又以水神最为重要。对水神的祭祀不仅包括“春祭三江，秋祭五湖”，^① 还以龙舟和龙灯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② 并且可以招云降雨。再加上春分到秋分之间的雨水，对于农作物生产，特别是江浙地区水稻的种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对鬼神的崇拜，经过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便逐渐转化为对佛教、道教的泛神信仰和各种民间神祇的普遍存在。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编写的《永康县志》风俗篇里，当地风俗特点第二条写的就是“信鬼神，重淫祀”，在下面还注着“出汉志”三个字。而在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编写的《永康县志》中，依然记载着在民间葬礼上不用僧道而用巫师的“陋俗”。

重利事功观念的形成，究其本源是因为江浙地区生活环境曾经十分恶劣，土地分散窄小且不利耕种，这便促使了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现在人们用“计然之策”来泛指生财致富之道。计然，又作计倪，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一位谋士。他的良策既包括一些从经验和现状出发，居安思危的思想，又包括一些商品经济的理论。到了南宋，即浙江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强调“各务其实”的陈亮创立的永康学派，提出了“义利双行”的观点，毅然站在了中国传统儒学和经学的对立面。他的思想，以及同属事功学派的金华学派和永嘉学派，却都在江浙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传播。思想上的解放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在浙江诸葛村的宗谱里，还记载有鼓励子孙从商的族训。商人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重利事功的思想更加根深蒂固。同样在明正德《永康县志》里，保留了自宋志中就有提及的“急于进取，善于图利”的当地民风。岩下老街一边是香火旺盛、佛道合一的方岩山，一边是家家户户做生意的程氏后人。信鬼敬神和重利事功的思想，不仅是老街文化形成的原因，并且渗透在当地文化的点滴之中。

^① （东汉）袁康，吴平辑．越绝书·卷十八．

^②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龙．

第二章

岩下老街的发展

一、影响岩下老街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

在江浙地区，像岩下村这样依附在丘陵地带河谷中的小村庄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如果没有接下来这几件事情的发生，岩下村可能就会像其他小村庄一样默默无闻下去，甚至有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失。幸运的是，正是这几件看起来相对独立，甚至在当时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才成就了日后的岩下老街，以及它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而要讲这几件事，还要从传说开始谈起。

从五峰的传说开始

相传这里很早以前是一片平地。孙悟空在蟠桃大会上随手扔了几个仙桃到人间，便长成了一片桃林。后来就有了一女四男五位年轻人，住进这里照看这片桃林。他们在这里生活到老，并共同演绎了各种版本的浪漫爱情故事。最后，他们一起变成了五座山峰。为了纪念这五位先人，人们就用这五位先人的特点依次给这五座山峰命名，并将它们统称为寿山，也叫桃岩。位于北面并有天然石洞，“较诸峰为淳固深厚”^①的叫固厚峰；固厚峰西面挂有瀑布的叫瀑布峰；瀑布峰东南是覆釜峰，故名思义它像一口倒扣的铁锅；再向东南，“岩色赤白相间，状类桃花”^②的叫桃花峰；最南面的因能听到鸡鸣声而叫鸡鸣峰。这五座山峰，峰峰相连，只在东面留了一个山口。而中间被围合的有山洞、有瀑布、有桃花、并可闻鸡鸣的山谷，则宛若人间仙境、世外

^① （清）程尚斐·五峰书院志·

^② 同上。

桃源。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日后便成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舞台和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地,同时也成就了一系列关于其他山峰的传说。最有趣的一个就是有一个蜈蚣精想霸占五峰,导致四面受敌的故事。由此便有了以蜈蚣山为中心,周围一系列山峰的得名。蜈蚣山位于五峰东边山谷的东侧,它的西面是鸡笼山,即方岩山,南面为蜥蜴山,北面是狮子山,西北边则是象鼻岗。

寿山寺的创建

在方岩地区的历史上,第一件重要的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梁普通元年(520年),这年寿山寺创建。寿山寺初名桃岩寺,位于五峰之一固厚峰下的石洞内,它是永康县境内最早创立的寺院。寿山寺作为一个佛教寺院的意义并不显著,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它为日后朱熹、陈亮等南宋学者提供了读书和讲学的场所,它同时也是明朝创建的五峰书院和清朝修建的胡则家庙的前身,它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提供了临时的办公场所。

火头和尚建大悲寺

在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一个来自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法号为“正德”的火头和尚,在方岩山顶上创建了大悲寺,即广慈寺的前身。大悲寺在一千多年间坎坷而富有戏剧性的经历,特别是它和当地胡、程两大家族之间的纷杂关系,都对岩下村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进士胡则

在宋朝统一中国并恢复科举制度之后,永康县胡库人胡则在北宋端拱二年(989年)进士及第,成为婺州地区首位进士。他在北宋年间为官四十七年,“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节”。^①由于他奏免衢州、婺州两地身丁钱,而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在他死后,对他的祭祀活动始于方岩山上广慈寺的读书堂,后遍布衢、婺两州。同时,他也得到了宋朝五位皇帝的八次赐封,^②并被当地百姓尊称为“胡公大帝”。对胡则的

^① (元)黄潘.胡侍郎庙碑阴记//库川胡氏宗谱.

^② 库川胡氏宗谱.

祭祀和崇拜不仅遍及江浙地区，而且远到江西、福建等地，并发展成为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这种民间祭祀活动，更是对岩下村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



胡则画像（《库川胡氏宗谱》）



陈亮画像（《永康览胜》，永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97）

状元陈亮

公元 1127 年，宋高宗举国南渡并把都城迁到了离永康仅二百五十里远的临安。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永康境内的文化氛围达到了鼎盛。在绍熙四年（1193 年），年已五十一岁的陈亮金榜题名中了状元，成为永康历史上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状元。而在这之前，陈亮已经在寿山寺内讲学十几年，并成为“永康学派”的创始人。在南宋时期江浙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陈亮提出了“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的颇具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打破了中国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的传统。在这个思想的进一步推动下，永康的社会和经济在南宋以后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商业和手工业更是比周边地区更加兴盛发达，因此素有“百工之乡”的美称。岩下村更是利用自身文化和地域的优势，发展起了其独特的旅馆和百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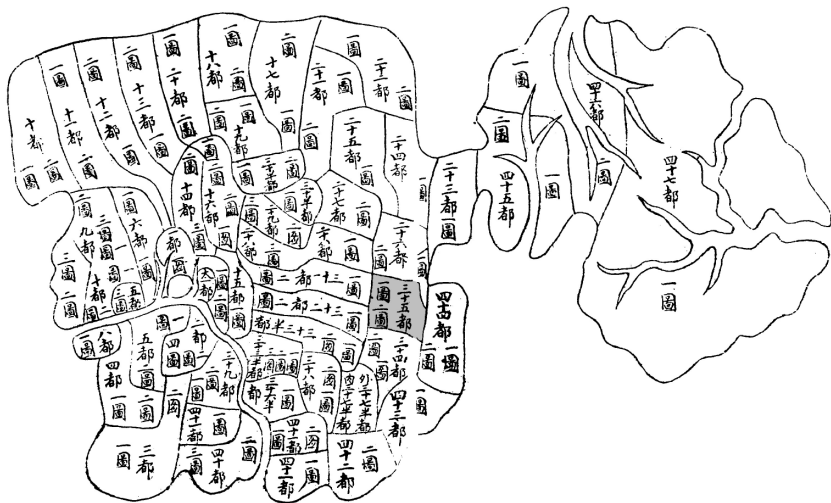
槐塘程氏的迁入

如果以上这些都属天时地利的外在原因的话，槐塘程氏的迁入即最终成就了岩

下村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永康程氏的始迁祖程锴于十四世纪初,携子从安徽歙县槐塘,经金华迁到永康衙后巷。几十年后,他的两个孙子又分别迁到了方岩山下的橙麓村和岩下村。程锴原本来自书香世家,他本人也是至元二十年(1283年)进士并曾任湖广廉访司副使。程氏的子孙则是本着“重文教礼义德行”和“士农工商各宜习业”^①的家训,在方岩山下生息繁衍了七百多年。是程氏的后人,把岩下村最终变成了一个极具特点的血缘村落。

二、老街的地理环境位置与自然环境

在明、清时期,永康分为十个乡、四十七都、一百一十二图。游仙乡内三十四都和三十五都所辖范围,缘其境内的方岩山而又被统称为方岩。方岩位于永康盆地东缘,其境内基本包括两组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山丘,其地理环境可以用“七山二水一分田”来概括。在这两组低山之间有许多更为低矮的丘陵,它们共同围合成了一条南北走向五里多长的山谷。山谷里有华溪的支流,方岩溪自南向北蜿蜒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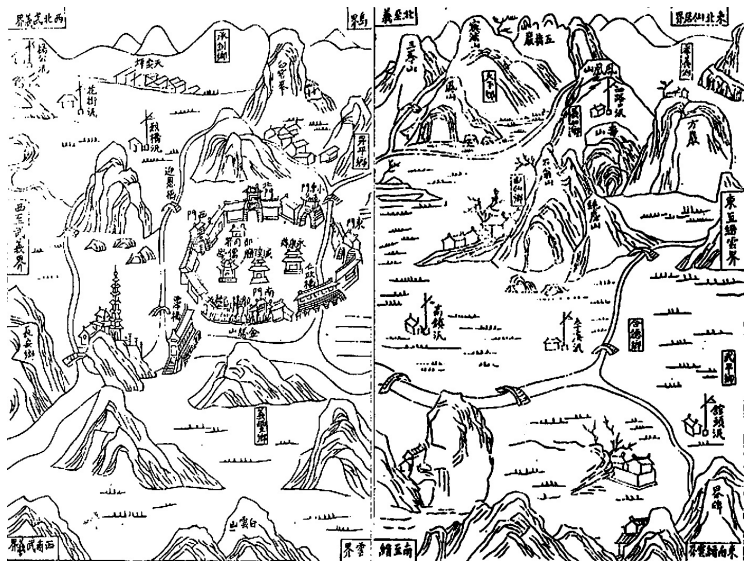
永康里居图,岩下老街位于游仙乡三十五都二图(图中用灰色表示)((清)李汝为:《永康县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卷首,图说)

^① 永康程氏祠规//后山头世远公宗谱.

岩下老街原本就是山谷之中、方岩溪畔的一条小路，路边的村庄因对面拔地而起的方岩山而取名为“岩下”。当这条小路的两边都盖满了房屋和商店时，路就变成了“街”，自然得名为“岩下街”。由于这条山谷只在北面有一个出口，出去以后向南二十多里可以到永康县城，向北则接东阳。与地处永康盆地内的其他村庄相比，岩下老街的位置交通更为闭塞。

由于这里的丘陵主要是由红色砂砾岩构成，而且十分陡峭，不能开垦梯田，因此这条山谷便成为村里的主要耕地。岩下老街紧贴着位于山谷的东侧一组低矮丘陵，由北向南分别是狮子山、蜈蚣山和蜥蜴山，相对较高的方岩山和象鼻岗则位于山谷西侧。方岩山脚相对较为平缓，又有一些植被，因此又被当地人称作坟山，用以埋葬先人。

这些丘陵之间又形成了几个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坑，坑中多有溪水顺地势流向山谷并汇入方岩溪。狮子山北面是较为开阔的割稻坑；狮子山和蜈蚣山之间是长一里多、宽度不过百米的下胡坑；再往南，就是总面积稍小一点儿的，位于蜈蚣山和蜥蜴山之间的上坑；蜥蜴山南边的斜坑，就是整个山谷的南端。这些山坑里还拥有村里另一部分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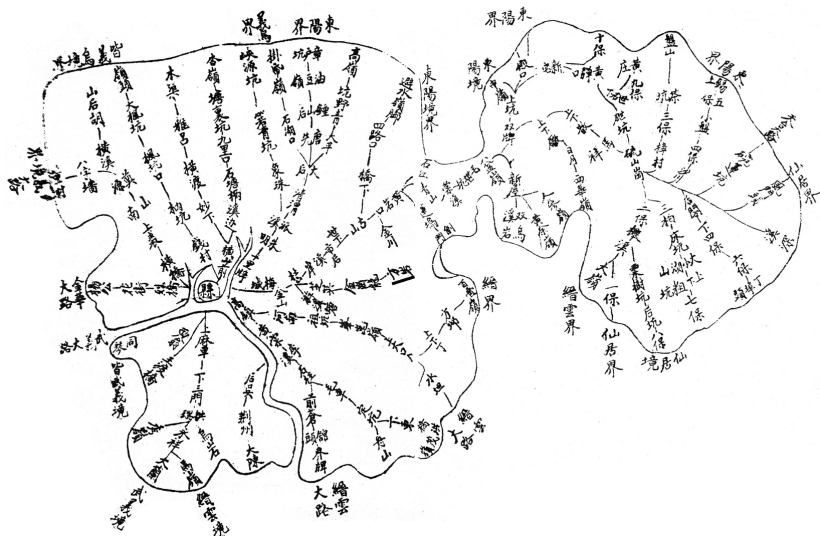
永康全境图 ((清)李汝为:《永康县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卷首,图说)



山谷周边的丘陵和山坑

在南方丘陵地区，由于受到地形的限制，村落中的住宅很难以祖屋或祠堂为中心向外发展。它们多是顺应地势，沿河谷或依山脚而建。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是要把最好的土地留作耕地；同时，离山近也方便打柴，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在这里也是最干净的；再有就是如果遇到洪水，这里地势相对较高，也会比较安全。老街途经的两个村庄，在选址上都是符合这个常理的，但是也有一些独到的地方。由于整条山谷南北走向，两侧的丘陵西高东低，所以山谷里的田地从早上到下午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日照。高度较高的方岩山位于山谷西侧，对于村落中的住宅来讲，它不但可以遮挡住夏天日落前燥热的西晒，还可以挡住冬天的冷风。另一边相对较低的狮子山、蜈蚣山和蜥蜴山，还可以保证山坑里的庄稼也能沐浴在阳光里。

岩下老街全长约三里，宽度仅二三米，中间原为青石板铺路，两边用鹅卵石镶嵌，与建筑台明相接的地方还做有排水沟。老街除了南边的一小段向西拐了两拐并结束于方岩山的入口之外，其余部分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并且一路都沿着山根儿和坑口。老街在狮子山北边的一小段属于橙麓村，橙麓村是以割稻坑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在



永康道里图上显示，官路到方岩就结束了（（清）李汝为：《永康县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卷首，图说）

坑口南侧，方岩溪几乎以垂直的角度从老街下穿过，转而平行老街继续向北。这几米长的石板路被称作“松门桥”。过桥向南，便属于岩下村了。岩下村是以上坑为起点，沿老街向南向北发展。在蜥蜴山南侧，老街向西拐的地方，方岩溪又一次从老街下面穿过。这一次，横跨方岩溪的是一个名曰“回龙桥”的小石拱桥，这也是过去岩下村南边的村界。在石拱桥东边的石柱上还写着“处州方岩大路”几个字，意为沿路继续向南就可以到达处州。从清光绪《永康县志》中收录的永康道里图来看，官路到方岩就结束了，而连接处州缙云县的大路则要经过方岩南面的峰昆岭。由此看来，这可能仅是条小路，或者可能会辗转接到山南边的那条缙云大路上。

三、槐塘程氏的迁入和村落的早期状况 （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中叶）

目前岩下村和橙麓村的居民，除极少数外，余下均姓程。世远公宗谱记载，永康程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九世纪周宣王的时代，而程氏第一家谱的编纂也早在西汉年间。到东晋年间，第四十五世祖元谭公因任新安（今徽州）太守，由于

他“有德于民，民留不得还”，^①从而成为程氏南迁始祖。自第三十世祖延坚公起，程氏便在安徽歙县槐塘居住。在槐塘居住的程氏已经发展为望族，程氏子孙“多以文章发身，超擢显爵，遂开基筑室，分上、下、正、旧四府居之”。^②下府程锴在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中进士，初任监察御史，后升为湖广廉访司副使。在延佑元年（1314年），程锴“奉命平云南寇，因被诬戍辰州（今湖南），后携子益宁避地金华石苍岭”。^③七年后，即1320年，程锴易名为楷，并带全家移居永康县城衙后巷。到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程益宁的儿子都已长大成人，程家便一分为三。长子闰一公程木留居衙后巷；次子闰二公程杉迁到了如今的橙麓村；闰三公程权则迁到了不远的岩下村。依据家谱中的记载，迁居岩下的程氏在几代之内都还保持了这种长子留居原籍，余下子孙迁去异乡的迁居方式。



永康程氏始祖范公及胡氏夫人像（《程氏元孝房谱》）

^① 应宝容. 永康姓氏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7: 128.

^② 槐塘本支迁派考略 // 独松世远公宗谱.

^③ 世远公宗谱.

程权，字可与（1333—1385年），别号得耕居士。宗谱中收录有《得耕公传》，其中阐述到他厌倦城市里的喧嚣，于是搬到方岩山东边居住，并“建楼匾得耕，曰，终身得耕陇亩足矣”，并由此得名为“得耕居士”。这幢住宅的原址应该位于目前得耕居的东侧，即更靠近山根儿的地方。程权想做一个隐士，但是他却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在他35岁的时候，明朝建立了。他认为“国初为官者朝不保夕”，从而拒绝从军参政。他为此先是断指，最终服毒自尽以求子孙日后平安。程权的子孙果然没有辜负他的一片苦心，程氏家族也在日后多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日渐兴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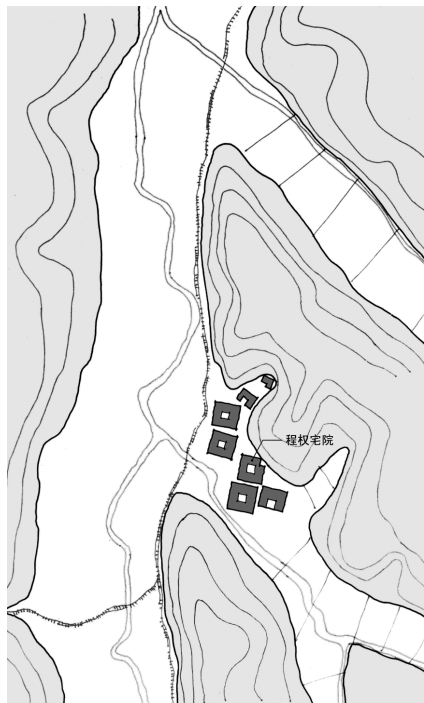
程权的夫人在他去世后三年也撒手人寰，撇下了两个幼子——鹏和洋。等他们长大以后，依惯例，程鹏留岩下，程洋迁居上呈。程鹏有三个长到成年的儿子——祚、禧和裕，分家之后他们分别做了天、地、人房的房祖。在明宣德（1426—1435年）初年，祖屋里不能再容下程家这三代十几口人了。于是在一番寻找之下，地房迁附东，后易村名为下宅；人房迁前刘；天房程祚（1392—1458年），字永延，带着当时还年幼的次子程垣和幼子程坚迁往凌宅，后易村名为独松；程祚的长子程坦（1411—1477年），字世远，一人留居岩下。

从三世祖程权到六世祖程坦这四代人期间，岩下村还是一个杂姓聚居的小村落，这一点可以从永康地区程氏各房派的家谱中找到线索。对于每个程氏子孙迎娶来的新娘，家谱中都会记载新娘的姓氏和原籍。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中叶，即程氏迁到永康的前一百年里，新娘还有不少是来自岩下村的，特别又以胡、任和陈姓居多，但是这种现象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便逐渐减少。

岩下村当时应该是位于上坑口内、蜈蚣山南麓、上坑溪以北、老街东侧的这块“背山面水，坐北朝南”的风水宝地。目前在得耕居东面，有十几幢散落分布的小型住宅，而且多是解放后建造的。据村里的老人讲，这里以前有三座大院子。从现在散落分布的村落布局中还能依稀勾勒出以前院落的平面。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院落的建筑年代较早，在“土改”分房时分到各家的房屋建筑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于是各家分别就地重建的结果。

程氏三世祖程权建造的有匾为“得耕”的宅院，位于现得耕居前面水塘的东侧，即靠近蜈蚣山的地方。这个院子可能也不是很大，村里当时或许也没有什么空地可以建更大的新房。以至于在宣德（1426—1435年）初年，程氏宁愿在别村买地建房，

也不愿或不能留在岩下村。当时村里的人口并不多，所以山谷里和山坑里的耕地应该能足以养活村里的人口，不然三世祖程权也不可能欣然于“终身得耕陇亩”的状态。相比住在永康其他地方的程氏，迁来岩下的这支人丁并不兴旺。但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为岩下程氏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四世祖程鹏曾“施广慈寺土田二十余亩，供奉忠佑侯胡公”；在明永乐乙酉年（1405年），他又“输纳东北一区税粮数百石不取贷。造飞桥，设义浆，济人往来”。^①又例如，在明宣德乙卯年（1435年）和正统乙丑年（1445年）当地歉收，五世祖程祚以“吾家颇饶，乃忍坐视其死”为初衷，替乡里缴纳数百石的官粮。^②家谱中类似的记载难免会有夸张的成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岩下程氏在当时也是衣食无忧的大户人家。



十四世纪中叶岩下村复原平面

四、程氏的壮大和村落的初步发展（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

岩下村的程氏，从第七世程鏊到第十四世，是一个逐渐壮大和发展的过程。六世祖程坦留居岩下后，一直膝下无子。年过花甲之后，便过继了住在独松的二弟程坚的第十一个儿子程鏊（1474—1548年）。不料三年之后，程坦就去世了，年仅三岁的程鏊便成了程家在岩下村唯一的男丁。家谱中记载他“童年立家，人称练达，好礼重义，应事刚果，许人以诺，终不渝”。经过大半生的努力，他到晚年便老屋的西侧建造了一个呈半月形的水池，池边筑亭，并在池后建了新居，这就是现在得耕居的前身。

^① 程公孟举墓表 // 世远公宗谱。

^② 永延公传 // 世远公宗谱。

据《世远公宗谱》中的描述，池底有用卵石镶嵌成“双龙戏珠”的图案。建筑外围台门砖雕“双狮抢球”，门额砖刻“得耕居”，并配花鸟浮雕。建筑内部为前厅后堂，其装饰之华美，以至于有人状告衙门说是程家私造宫廷。程鏊也因每日消遣在这位于方岩山东边的亭台里，而被称为“东亭居士”。程鏊在独松村的侄子，礼部侍郎程文德（1497—1559年）还亲笔题写了“树德堂”及楹联“栋宇初成家有庆，簪缨世显国同休”挂在前厅。程文德日后还深刻评论了得耕堂中的“得耕”二字的深远含义。他这样写道，“禹稷躬稼，文王即田，功诗咏豳风，礼著耕籍，咸重耕者也。耕者生民之本，衣食之原也。得耕则以勤而兴，不得耕则逸而亡”。^①有了这座大房子，再加上“得耕”和“树德”这四个字，程氏后人就在岩下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发展成为望族。程鏊有两子六孙，两个儿子分为松、柏两房，六个孙子再次分做福、禄、寿和日、月、星六房。由于日、月、星三房的人口一直不多，所以他们一直被统称为柏房。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四房人谁也没有再迁出岩下。

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岩下村的程氏都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正如家谱里记载的一样，他们每个人一生中值得记下的事情无非是出生、死亡、娶妻和生子。但是他们却逐渐在岩下村拥有了更多的房屋和土地。到了第十三世，禄房下出了一个作勳公（1646—1725年），名际烈。《世远公宗谱》中把他描述为“性情敦朴，节俭持躬，铢积寸累以成家业。而资雄里闰，每遇岁歉必出粟赈饥，凡有求者缓急靡不相济。人皆德之”。郡侯张公也敬仰他的德行，并赠匾曰“熙朝逸叟”。作勳公不但儿孙满堂，而且他们也都得到村里人的尊敬。其长子伊臣“文艺精通”，^②并且独修宗谱；次子经臣“善承家业”。^③直到今天，作勳公及其子孙还都是村里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老人们都会掰着手指，兴致勃勃地讲：作勳公有两个儿子，友常和恭常；友常有四个儿子，叫琴、棋、书、画；恭常也有四个儿子，为发、强、刚、毅。村里人提到的这些字，都是房派的名字。虽然从家谱上看，友常，即伊臣只有三个儿子，所以琴、棋、

^① 得耕公传 // 世远公宗谱。

禹稷：指夏禹与后稷。夏禹后稷受尧舜命整治山川，教民耕种。

躬稼：亲身务农。豳风：《诗经》的十五《国风》之一。

^② 世远公宗谱。

^③ 同上。

书、画可能只是反映了人们对他们所尊敬的人的一种完美的希冀。村里的两座重要祠堂，世远公祠和作勳公祠应该就是在这期间先后建成的。从两个祠堂的位置可以看出，程氏在岩下拥有的房产和地产，又向西推进了一大块。岩下程氏已经俨然步入了当地望族之列，那时向他们提亲的也不乏附近一些官宦人家。

在程氏家族逐步壮大的过程中，岩下村也随之发展起来，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程姓血缘村落。村落的建设在这一时期越过了老街的界限，向西面地势较低的山谷地带发展，并以方岩溪作为新的村落边界。据村里的老人讲，在方岩溪、老街和蜈蚣山并到一起的地方，曾经有一座门，也被称为“城头”。它标识了岩下村北面的入口，城头外面当时则是一望无际的田地。



十八世纪中叶岩下村复原平面

十六世纪初，在陈亮曾经讲学的寿山坑内相继落成了丽泽祠和丽泽精舍，后易名为五峰书院。明末，又在丽泽祠的西侧建了学易斋。这里便成了学者云集的地方，仅明朝在五峰书院研习的进士就有三十多人。曾在这里主讲的学者有三位是永康程氏后人，他们分别是独松村的吏部左侍郎程文德（1497—1559年）、文楼村的程梓和程梓之子四川左布政使程正谊。岩下村的程氏虽然没有人在寿山讲学，但是鉴于五峰书院仅在三里之外，去听的或许不在少数。况且当时岩下村七世祖程鏊是从独松村过继来的，即程文德的叔叔，所以这两个村的程氏一向相互往来密切，程文德难免会把他在五峰书院结交的朋友带到岩下小坐。《世远公宗谱》中就有记载，程文德在程鏊建的“池亭设宴招待明学者礼部尚书黄绾”。

与此同时，方岩山上的广慈寺也在逐渐发展壮大。特别是在十七世纪中叶，当胡公像被移入大殿供奉之后，广慈寺的香火变得更加兴旺。岩下老街是上山的必经之路，无论是慕名而来的香客，或是每逢初一、十五从下属寺院回来述职的住持，



程茂发（左，1934年生）和程化求（右，1914年生）两位老人在激烈地讨论着作勳公的话题

还是每年清明上方岩山祭祖的文楼村程方峰的后人，都要从岩下村穿过。当时，大部分需要住宿的香客都是借宿在广慈寺的僧房或大殿里。但是，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文楼村的程氏可能就已经开始在天街上做一些蜡烛和供品的生意。不难想象，和文楼程氏同宗的岩下程氏，也可能在正月和八月农闲的时候，也就是香火最旺的时候，在自家门口做些茶水、小吃或当地特产之类的小买卖。

五、程氏的鼎盛和村落的线性发展（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

岩下程氏自十五世纪起，便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作勳公的孙子，程经臣的小儿子程立重（1736—1793年）。程立重字逢时，号毅庵，是毅房的房祖。关于这个字“逢时”的程氏后人，还有一个被称为“岩脚竖花厅，丈人倒贴银”的美丽爱情故事。相传程立重自小就和住在芝英紫霄观，知县应炜公的女儿订了婚。这个生于官宦人家的小千金，从小就备受宠爱。在她十三岁的一天，家人为了寻找她丢失的毬子，竟无意中发现了埋在家里的十八桶白银。应炜公认为这是女儿的缘分，就决定将这十八桶白银留给女儿长大后做嫁妆。不仅如此，应炜公还怕女儿嫁出去吃苦，于是在过门之前，派人到岩下村为女儿建好了一座三厅两堂的三进宅院，院子大到可以容下“屋里塘”和“屋里井”。程立重为了报答丈人赠银之恩，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不惜重金在新居西边造了雕饰精美的绍常祠堂。

岩下村北面的村口原本是村落发展的一个天然边界。出村口向北的一段距离内，

方岩溪和老街之间的空间太小，不足以容下一个院落。不仅如此，老街随山势逐渐爬坡，和山谷中的田地形成了一定的高差，这更增加了建造的难度。但是，程立重及其后人在短短几十年中持续的建设，使程氏的家业不可能仅局限在下坑口附近，而是不得不开始沿老街向南、向北，在山谷里寻求发展。

程立重宅院位于下坑口的南面，院落西墙紧贴着方岩溪，东墙外则是蜥蜴山，老街被卡在建筑和山体之间。绍常祠堂位于这座新宅的西侧，即方岩溪的西岸。在嘉庆二年(1797年)，程立重的后人在村口以北又建造了一座新的院落，后来被称为“义丰雅记”。从村落建筑布局以及山势、道路和河流之间的相互关系推断，这几幢建筑当时应该都是建在原有耕地之上。对已有耕地的占用，说明了人口的增长。而人口持续增长和耕地逐渐减少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加速其他非农业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程立重宅院和义丰雅记在对地形的处理上还有一些相同点。老街的地平是起伏起伏的。通常来说，靠近坑口的一段比较低；紧贴山麓的部分则比较高，最高的地方可能和方岩溪有将近一层的高差。程立重宅院和义丰雅记的选址都位于老街和方岩溪有一定高差的地方。它们的处理方法都是采用不规则形状的石料围做墙基，中间用夯土填平，这样把院落抬到和老街同高。在这两个院落的西面，方岩溪几乎都是紧贴着院墙向北流，并在院落南北两侧各有一个将近九十度的转弯。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出，为了建造这两座住宅，人们可能还对河道进行了相应的修整。

在十九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又有不少建筑相继落成。紧贴义丰雅记北面和南面各有一座宅院先后落成，它们前后连通，构成了一组被称为“风、雅、颂”的三进院落。在狮子山和蜈蚣山之间的下胡坑坑口，禄常祠堂、程正伟火腿店、新隆兴旅店还有经堂沿老街西侧一字排开。

由于这些新院落的建成，村落的范围进一步向北扩展。对村落有保卫作用，同时也是用来“拦风水”的“城头”，也被移到了下胡坑坑口的北边。它沿着下胡坑溪的北岸，横跨狮子山和方岩山之间的山谷。城头是一堵约两丈宽、一丈高的土墙，墙头种有四季常青的樟树。每年正月十三，当闹龙灯的队伍走过城头的时候，龙头和龙尾还要在这里嬉戏一番，当地叫“跳灯”。